人物研究

王源交游及其遗民子弟的一生

刘仲华

[**摘要**] 王源是清初颜李学派的重要传人，也是清初经世致用学风的倡导者。作为遗民子弟，其交游经历与其学术思想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王源一生的交游经历，既是一个遗民子弟在清初社会中境遇的缩影，也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则从个案的角度呈现了清初经世致用学风的变迁趋势。

[**关键词**] 王源　士人交游　经世实学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 (2006) -06-0065-10

Wang Yuan: His Friendships and Lifetime Loyalty to the Ming

Wang Yuan was an important disciple of Yan - Li school, and an advocate of the statecraft study style of the early Qing. As an adherent of the Ming, there wa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Wang Yuan's friendships and the formation of his scholarship. Wang Yuan's life time experience of making friends was the epitome of the experience of a Ming loyalist's life in the early Qing, and reflecte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ditions of the time as well.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Wang Yuan's scholarship presented the trend of the statecraft study style in the early Qing.

王源（1648-1710），字昆绳，号或庵，顺天大兴（今北京）人。其父王世德，明亡前为世袭侍卫，京师陷落后携子赴江苏扬州、宝应一带居住三十余年。王源幼时受父亲影响，“喜任侠，言兵”。稍长，从学于遗民梁以樟与魏禧门下，仰慕英雄豪杰，“所交多瑰奇隐异之士”。康熙二十四年（1685）随父北返，“游京师，佣笔墨”①，参与《明史·兵志》纂修。此后十余年间，王源结识了万斯同、刘献廷、方苞、戴名世、阎若璩等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王源与来京应试的李塨结为挚友，又经李塨引介，拜颜元为师。康熙四十九年（1710）客死淮安。

作为遗民子弟，王源原本是个“自命英雄”，“议论磅礴古今”②的狂士，“独从事于经济文章，期有用于世”③，但在近二十年的游历之后，不仅锐气消磨殆尽，而且深感所学“卒归于无用”④。晚年“一敛其凌轹之气”⑤，致力于著述，撰有《平书》十卷、《读易通言》五卷。可以说，王源一生是许多遗民子弟在清初政治社会中交游和境遇的缩影。“古之人无论出处，莫不有友以为辅，同道相济，同志力相成，故观其友之盛衰，而其生平大可见。”⑥士人交游经历与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即通过王源一生的交游经历，以了解他作为一个遗民子弟在清初社会中的境遇及其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

一、康熙二十四年游历北京之前

对于遗民子弟来说，家庭遭遇的影响显得尤其重要。王源的父亲王世德在明亡前只是个

[**收稿日期**] 2006-1-15

[**作者简介**] 刘仲华（1973—），男，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地位很低的侍卫，明亡之际大可不必坚持遗民气节，但事实并非如此。王世德作为宫廷侍卫，经常“待烈皇左右，目击时艰”[7]，“凡天子兴居食息及仗下谟谟陈奏，靡不目睹而亲闻”[8]，也正因为此，他对故国的怀恋反而更深厚。李自成军队攻破北京之际，王世德因“自刭不死”，无奈“弃家走吴越”，流寓江南三十余年。在流寓期间，王世德经常是“颓然纵饮自放”，所结交者也都是些遗民，与“梁鹪林先生偕隐宝应，南北则中州崔履斋、宁都魏叔子诸先生，暨义僧松影，时往来无间”，“每谈当日人才政事亡国之由，及朝廷礼仪大典，委备详核，竟日夕不倦”[9]。王源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讲起明朝的“朝仪典故”以及“中外轶事”，当时的他深深被这些故事所吸引，“娓娓忘倦，或侍饮至深夜”，讲到情真意切处，父子两人甚至“相对唏嘘不寐”[10]。可以说，父亲王世德的遗民悲痛深深地烙在了王源的内心世界。

王源七八岁时，与兄王洁奉父之命，从学于梁以樟。梁以樟，字公狄，别号鹪林，先世保定清苑人，后徙京师。明亡之际参与史可法部抗击清军，南京被攻破后，梁以樟与兄梁以枏“遁迹宝应之葭湖”，其人“性喜酒，尚义慷慨，有幽燕烈士风，酒酣论古伯王豪杰奇谋伟绩，或及中原杀贼两京轶事，悲歌仰天呜咽，或月夜登高痛哭”[11]。由于王源当时年龄小，梁以樟在学术上对他的影响还比较小，但其遗民气节和慷慨悲壮的性格给王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的王源还经常回忆起他年少时与老师梁以樟、好友刘雨峰在一起的情形：“予幼随先人寓宝应，予兄汲公偕予与雨峰为兄弟交，予师梁鹪林先生亦寓宝应，父师皆以患难，九死余生，萍聚他乡，晨夕歌哭，淋漓酣痛。予兄弟日侍左右，其习于感慨无聊不平，宜也。”[12]

少时的一些好友也对王源性情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如刘雨峰，与王源为兄弟之交，当时的他“时时与故老、遗民、酒徒为世外交，所谈者多兴亡之事，羁旅无聊，伤心之语，愁然有动于衷而不觉也”[13]。又如秦敬传，与王源之兄王洁为忘年交，常在一起慷慨谈论，给旁听的王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年的王源回忆说：“予方五六岁，舍人数至予家，谈燕竟日夕，满引长歌悲啸，其丰神至今犹记忆之。”[14]

梁以樟于康熙四年（1665）去世，年仅五十八岁。之后，王源又从学于清初著名遗民魏禧。魏禧（1624－1681），江西人，诸生，明亡后逃至山中隐居，与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邱维屏、彭任、曾灿以及兄魏际瑞、弟魏礼九人，讲《易》其中，时称“易堂九子”。魏禧初见王源，“辄器之”。在他眼里，王源不仅写文章“议论多肯要”，而且“文之可施于用者十而五”，称赞他为人“岸异多英气”，“伉爽好大略”[15]，并比之以东汉复兴大臣邓禹和三国时期周瑜。晚年的王源经常回忆起恩师魏禧的期许：“余自幼受知魏先生，先生序余文，尝期以邓仲华、周公瑾。”[16]魏禧讲学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尤其好谈兵。这对王源一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称：“易堂魏叔子先生其言大与愚见合，故生平议论，间窃易堂绪余，而酷喜谈兵，讲究伯王大略，物色天下伟人奇士而交之。”[17]

在寓居扬州时期，王源还结识了很多意气相投的“奇士”。康熙十八年（1679），王源与新安“奇士”黄元治、洪璟（字去芜）“订交”，“皆兄事之”。黄元治“倜傥负大志，常欲立功万里”[18]，王源非常欣赏其才能，称赞他“负真才，可以实任天下事”[19]。洪璟则“貌温色和，言必称先王，而胸怀经世之略”。当时的扬州虽是劫乱之余，但由于交通的枢纽地位以及其特殊的文化氛围，依然是遗民、奇士云集的地方，正如王源所言：“时天下士多集广陵，日相与纵横谈天地古今之变，旁及山川形势，暇则饮博歌呼为笑乐，其意气之盛，慨然若前无古人者。”[20]处于这种交游网络中，王源的性情和抱负自然也多了一分遗民情结。

在学术旨趣上，此时的王源“喜任侠，言兵”，而且“习知前代典要及关塞险隘攻守之略”[21]。他自己多次声称“自幼喜谈兵”[22]，“生平为文，论兵者居多”[23]。出于这种抱负，王源在这一时期撰有《兵法要略》和《舆图指掌》[24]。前者主要内容是攻战策略，后者则是总论天下地理形势。在王源心目中，“兵法与地理相表里”[25]，他不仅重视研究兵法策略，

而且特别留意“山川形势”，“为兵家之实用”。因此王源对山川地理的关注与一般的地理学不同，“非如近今舆图家第详于山脉、河流、都邑、物产”[26]，其最终目的是成就“勘乱之才”[27]。此外，王源还撰写了《权论》、《将论》、《战论》、《八阵论》等文章，探讨兵战之法。可见，当时的王源确有“谈兵、考形势”的经世气概。

也正因为此，王源在游历京师之前，其心胸气魄是很大的，谈吐间常常纵论山川险要、攻守之势。试观王源在康熙十六年（1677）与江西人胡心仲的这段对话：“丁巳八月，遇南昌胡心仲于江都，余久知心仲非常士。既见，谓余曰：子胡不游？游当自吾江西始。余尝谓：金陵、武昌俱前临大江，控南服，有雄视四方之势。而江西缩处其间，独九江一郡濒江，据鄱湖之口，为江西北门，若东失于楚，则南昌数郡，如处囊中，而浙闽可以冲其膺。湘湖岭表可以瞰其背，故卓敬请改封燕王于南昌，宸濠见禽于新建。”[28]这段话概论长江险要，俨然是个军事战略家的眼光！

毫无疑问，王源作为明遗民后代，其家庭所经历的鼎革变迁对他早年的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王世德在明亡前没有什么功名，没有像吴伟业那样成为清廷笼络、招抚的对象，而仅仅是个宫廷侍卫。也正因为此，王世德了解崇祯皇帝的处境，一直保持着对故国的怀恋。在江南流寓期间，王世德所交往的人也多是遗民、处士，每天谈论的都是“政事亡国之由”。王世德好友梁以樟、魏禧先后成为王源的老师。不仅如此，王源青年时期的交游者也多是梁份、黄元治、洪璟这样“胸怀经世之略”的“奇才”。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影响和时代氛围中，王源感同身受，自然形成了不入流俗、感悲故国的慷慨性格以及“喜任侠、言兵”的学术旨趣。这也是清初经世致用学风形成的重要因素。

二、康熙二十四年至康熙三十九年结识李塨之前

王源第一次返回北京是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这一年，他将父亲王世德所著《崇祯遗录》[29]献于《明史》馆。在北京，王源结识了以“布衣”参与《明史》纂修的万斯同，又经万斯同向时任监修的徐元文引介，王源以宾客身份参与《明史》纂修。此后几年间王源在北京结交了很多学者，甚至为公卿所引重，经常参与一些名流聚会。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已八十的王士德在流寓南方数十年后，思念故里，王源遂携父亲北返。到天津后，在盐商张霖的盛情邀请下，王源父子暂留天津。次年即1693年，王源参加科举考试，考取举人[30]。当年十一月王世德去世，遂葬于北京西山祖茔。此后的王源放弃举业，开始了后半生的游历生涯。

从王源本人来讲，他对科举时文考试是根本看不上眼的。王源曾说：“八股果足以造天下士乎？原立法之始，特欲合天下之心思耳目，并出于孔孟之途。乃文章不同于政事，自古已然。”[31]既然如此鄙弃举业，王源为何参加了科举考试呢？据载，“源初未尝为时文，人或以此病之，源笑曰：是尚需学而能耶？因就有司求试，中式康熙三十二年举人。”[32]按照这种说法，王源起初参加科举考试是因为有人讥讽他不会写时文。为证明自己的能力，他才参加了当年的考试而且果然中式。

其实，王源参加科举考试，并非这么简单，我们从其随父北返的举动中可以窥见一二。王世德在明亡后流寓江南三十余年，但最终还是北返，这其中除了“思念故里”、叶落归根的观念使然，与他面对现实、接受清政府统治的心态有关。当时的清朝统治局势已经基本稳定，为胜国修史的《明史》纂修也进入了实质阶段。康熙二十四年第一次返回故里北京，王源就将父亲所著《崇祯遗录》的副本献于史馆，可见是有所准备的。在北京，他结识了以“布衣”参与《明史》纂修的万斯同。万斯同这种“纂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33]的行为，不仅影响了王源，也肯定通过王源之口为王世德所知。王世德作为遗民，对待新朝的态度已经有了变化，他本人已年迈衰老，但年轻儿子不能因遗民子弟的身份就断绝仕进之途。因此，王源将《崇祯遗录》献于史馆，必定是受到了父亲王世德的许可或者鼓励，后来参与《明史》纂修乃至参加科举考试，也

莫不如此。王世德去世后，王源便绝意不再应试，也可见，当初王源参加考试多少带有宽慰父亲的考虑。

王源为何很快又决定放弃科举仕途呢？据管绳莱在《王昆绳家传》中所言，王源中举后，有人“劝更应礼部试”，他回答说：“吾寄焉为谋生计，使无诟厉已耳。”[34]看来，他放弃举业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担心后人“诟厉”自己。遗民是否“世袭”，这是清初遗民及其子弟所面对的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作为遗民典型的顾炎武曾说：“生子不能读书，宁为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35]祝渊在临终遗命中也告诫子孙“不得读书应举业”[36]。但这毕竟是少数而且说这些话的时候明朝刚刚灭亡不久，更多的遗民则是默许子孙出仕的，如李顒不仕而其子应试，冒襄入清不仕而其子出仕。[37]王源身为遗民子弟，生于清朝，而且此时已经离开明朝灭亡近半个世纪，参加科举考试本来无可厚非。但显然，其遗民弟子的身份还是让他产生了顾虑。而且王源的担心没有多余。他中举后，友人方苞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进行委婉规劝。方苞说：“吾兄得举，士友间鲜不相庆，而苞窃有惧焉。退之云：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愿时自觉也！”[38]方苞在信中对王源中举表达了既喜亦忧的心情，并以韩愈之语相劝，希望他慎重择取仕进之途。另外，王源死后，好友杨宾在追忆他的律诗中有“惜哉制科误，遂失处士尊，晚节乃知悔，盖棺谁与论”[39]的句子。不管是出于自己对科举功名的鄙夷，还是遗民子弟身份的束缚，王源决定放弃仕途，终生不复应试。

放弃举业并不意味着弃世隐居，相反，由于士人传统的使命感，“自负经世之略”的王源坚持认为在仕途之外同样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所谓“圣人仕见功，不仕亦见功，用舍有时异，利器操乎己”[40]。对于王源来讲，参与《明史》修纂，既是“为谋生计”，也是继承父志、感悲故国最现实的途径。

从现有的各种记载来看，王源参与《明史》纂修的方式既不是纂修官之类的史馆官员，也不是像万斯同那样的“布衣”影舞者，而是以徐元文宾客的身份，协助“布衣”万斯同进行《明史》纂修。据《清儒学案小传》，王源“年四十余，游京师，大学士徐元文宾礼之，文史必就质，《明史·兵志》其所作也”[41]。又据《清史列传》，王源“与鄞万斯同订《明史稿·兵志》，源所作也”[42]。从王源此时的学术兴趣来看，他参与《明史·兵志》的撰写也是顺理成章的。王源早年即留心兵法，尝自言：“源于兵法略有管窥之见，恨天下无一人足语。”[43]他又在游历京师之前后撰写了《兵法要略》等文章，探讨兵战之法。至于王源参与《明史》纂修的前后过程及其时间，因记载缺乏，已经无从查考，仅从《居业堂文集》中所保留的与修史有关的几封书信来看，王源还是很投入的。就《明史》编纂之体裁体例，他时常与徐元文、万斯同进行商讨，如《与徐立斋学士论王威宁书》、《与友人论韩林儿书》、《与友人论史书》等，或讨论人物的定位，或探讨传记详略之法，所论颇有见地。

然而，对于王源来说，更重要的是他在参与修史期间结交了很多熟悉明末历史的故家子弟。如，鄢陵人常翼圣，熟习明末故事，王源便经常到他在北京的居所谈论明朝末年的历史，“每过公，谈燕竟日夕”。常翼圣还多次劝说王源“以《明史》自任”[44]，期许王源能写一部明史出来。又如，孔尚任在北京期间经常“竭俸钱、典衣”，邀请王源“时时煮脱粟、沽酒，与唱和谈燕，酣嘻慰藉”。王源非常欣赏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甚至将此书与其父王世德所著的《崇祯遗录》相比拟。王源说：“予知先生久，是时初往谒，则读其所为《桃花扇传奇》，盖谱弘光南渡轶事，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故，情词淋漓悲宕。予又质以先君子所为《崇祯遗录》，相与慷慨太息。”孔尚任曾任户部员外郎，其《桃花扇传奇》完成以后在京城上演，因涉忌讳，遭人诬陷而罢官，罪名是影射当朝。孔尚任离京之时，王源撰送序以赠，感慨“今之留心人才，以朋友为性命者几人哉？”[45]

王源在北京参与修史期间，结交了很多人，其中与刘献廷、万斯同等人的交往最为密切。

康熙二十四年，王源就馆于徐元文家，次年便结识了应徐元文之请参与《明史》纂修

的大兴人刘献廷。刘献廷“颖悟绝人，博览负大志，不仕，不肯为词章之学”，“慨然欲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从性情、学术旨趣上看，刘献廷绝对是王源的志同道合者。两人一见如故，视为知己。王源说：“与处士道同志合，日讨论天地阴阳之变、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兴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见之同，犹声赴响。而处士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法、法律、农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涘。”王源称刘献廷为“上下千百年中不数见之人”。四年后，刘献廷离开史馆，南游衡岳，“困而归”，正当谋划“与同志结茅，著述终老，乃不一年死”[46]。刘献廷死后，王源“笃痛欲绝”，“与友人敛金为位哭之”[47]。

当初刘献廷南游之际，曾经与王源、戴名世、万斯同、蔡廷治（字瞻岷）、宁世簪（字观斋）等十余人相约“偕隐”金陵。王源在《送臧侍御序》中说：“初，君与余有卜筑金陵之约，余友宁观斋、刘继庄、蔡瞻岷诸子凡十余人，俱相期偕隐金陵。”[48]金陵作为明朝旧都，在他们眼里，具有不一般的意义。正如王源所说：“金陵风土兼乎南北，四方之所辐辏，士之不得志于时而游历其土者，往往而是。”[49]此时，清朝统治已经稳定，相约隐居金陵的意愿，虽不能说这就是反对清朝统治的意图，但至少是他们这些遗民及其子弟对待现实的一种“弃世”态度。

不过，他们“相期偕隐”的最终目的不是隐居而是著述。戴名世在《送刘继庄还洞庭序》中说：“继庄有友曰王昆绳及余二人，约偕诣洞庭，读其所购书，而继庄家无担石之储，无以供客，余二人之行皆不果，而继庄先携其书以归。”[50]与万斯同多有交往的遗民诗人刘坊在《万季野先生行状》也说：“明年昆山归里，继庄以馆俸之得，钞史馆秘书无算，持归苏之洞庭，将约同志为一代不朽之业。”[51]而“一代不朽之业”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有明一代历史。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志趣就是对明朝历史的关注。万斯同自不必说，他作为黄宗羲弟子以布衣参与《明史》纂修，正所谓“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52]。刘献廷经徐氏兄弟多次延请，参与《明史》纂修，也是出于对明朝历史的寄托。戴名世曾言：“继庄尤留心于史事，购求天下之书，凡金匮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志、野老遗民之所纪载，共数千卷，将欲归老洞庭，而著书以终焉。”[53]至于戴名世本人也非常重视明史，平生以修撰《明史》为己任。他曾经撰《孑遗录》，纪桐城变故始末。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偕隐”“为一代不朽之业”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刘献廷走了，王源、戴名世等人则继续着在北京“行歌燕市”、“倾身菽水”[54]的游历生涯。万斯同则在徐元文、徐乾学兄弟之后，又馆于总裁王鸿绪家，继续协修《明史》。

万斯同是当时与王源关系最为密切的友人。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康熙十七年（1678）被荐博学鸿儒，力辞不就。次年到北京，参加《明史》纂修，不署衔，不受俸，前后十九年而卒。万斯同与王源初次相见时，赏识其“磊落英杰之气”的品性与抱负，“爱而友之”。其实，类似的人生经历才是两人有共同语言的关键。康熙三十一年（1692），万斯同应王源之请，为其父王世德八十岁生日祝寿。在寿序中，万斯同就说：“余家自始祖以来，世官外卫，颇与王氏类。先君子以老孝廉坎壈没世而不悔，亦与先生相若。”[55]由于万斯同的引介，王源得以与游历北京的许多名士如戴名世、杨宾、黄叔威等人往来，谈论经史之学。他们这种讲论聚会甚至被时人称为“经济会”。费密之子费锡璜在《掣鲸堂诗选》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梅花堂者，黄叔威所居。叔威文采气谊倾动一时，京师名流罔不萃集此堂。而往来尤频者万季野、宋豫庵、杨可师、王昆绳、朱师晦、王肤功、戴褐夫、田子相、郑望士、杨东里、陈尧凯、韩敬一。或谈经济，或论文章，或考史册，诚一时胜举，当时目为经济会。”[56]康熙三十九年（1700）左右，王源结识到北京参加会试的李塨，李塨则通过王源得与万斯同相识。之后的两年间，王源、万斯同、李塨、毛奇龄以及胡渭、冯蕴等人，经常在一起讲论经世致用之学。康熙四十一年（1702），万斯同卒于《明史》馆。应该说，王源、刘献廷、万斯同等人在当时北京所

形成的学术交游圈，对清初经世致用学风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个交游圈中，王源还有两位重要的性情之交：戴名世与方苞。

方苞生于1668年，比王源小二十岁。两人在没有来京师之前就已结识，但当时交往不多。康熙二十六年（1687）戴名世初到北京，结识王源。四年后，方苞也来到京师，三人遂成为知己之交。这一点，从后来仕途最好的方苞所言中可以略见一斑。康熙三十一年（1692）秋天，王源前往湖口榷使幕，同年十一月，戴名世因祖父去世也离京返乡。独自留在京师的方苞甚为怀念他们三人在一起的惬意时光。康熙三十二年（1693），方苞在给王源的信中说："苞从事朋游间近十年，心事臭味相同，知其深处，有如吾兄者乎？"[57]

对于戴名世，王源非常欣赏他的文章才能。他说："田有古文，同人中予最所推服。"[58]除此之外，两人的境遇和性格也颇为类似，都是落拓京师，性情孤傲，不入流俗，甚至因"狂妄"而得罪了很多人。戴名世曾说："余与昆绳，行歌燕市，一市人皆笑之。羁穷落拓，此数人者大抵皆同，而余辈之穷，至欲读书而不得，此天下之所以不读书也。"[59]后来，王源、戴名世两人或西游关中，或南下金陵，时分时聚，但依然保持者密切的来往。

康熙三十八年（1699）左右，因流言议论挑拨二人关系，王源与戴名世之间一度出现误会。我们知道，王源和戴名世都是性情中人，很少嘉许他人，两人皆擅长古文，名噪一时，而且自许颇高，因此也得罪了很多人，不免招来嫉恨。为消除误会，王源积极主动与戴名世沟通。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王源写了一封信，委托即将出都的方苞捎给正在南京的戴名世。王源在信中说："源生平落落，所称同志之友如吾子者，不过数人，今已大半凋丧，每用痛心疾首，伤吾道之孤，则吾两人宜何如亲信，何如倚重？乃卜居一事，其为我谋者何心？我两人相期许夙昔之相知者又何心？顾谗言不能察，遂疑源之忍于相负，等于世俗不肖者之所为，则所以知我者安在乎？且不肖之踪迹显然，众知共睹，初非暧昧不明，可为饰辞以欺人者。故人之子刘补过、蒋湘帆，与不肖周旋讫今，凡诬蔑之言，一一可质而白，不待源之哓哓置辩也。"对于这些挑拨离间的议论，两人或托人勤勤劝解，或互相"通融相济"，误解消除，但外界关于两人交恶的传言似乎仍然不断。正如方苞在这封信后的按语中所言："田有与或庵交最深，忌者莫能间也，而人之忌或庵者，又且比比，及田有偶为流言所惑，于是蜚语四播，几令两人不得全其交，田有已辨其诬，与或庵相好如初，而言者犹不息，殊可叹也。"[60]不难想象，像王源、戴名世这样性情孤傲、不流于世俗的人，很难在当时的社会中游刃有余，也难怪戴名世因遭人嫉恨而酿成《南山集》案。

在此次流言事件以后，王源、戴名世各为生计，奔波异地，南北间隔，两人便再也没有见过面。康熙四十九年（1710）秋，王源客死淮安太守姚陶署中，好友李塨、方苞、蒋衡、杨宾等人先后哭之以诗文，独缺戴名世。此时的戴名世刚刚在头一年考取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正游于公卿之间。然而这种生活还不到一年，即于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遭到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参，《南山集》案发，戴名世逮治入狱。不久，很多为戴名世文集作序以及刊刻的人，如方登峄、方世樵、汪灏、刘岩、方苞等，都被逮入狱。王源因曾为《南山集》作序也在被刑部逮治的名单中，但当时王源已死，得以幸免。可以想象，如果王源再晚死一年多，肯定也难逃牵连。

王源在北京游历期间，生活并不安逸，有时还很困顿。王源说："余生于燕，南不逾钱塘，东西仅得齐、鲁、宋、楚之半，志在四方久矣。蹉跎羁绁，困穷莫能遂。"[61]迫于生活的压力，他不得不到处寻找生计。除了协助万斯同修《明史》之外，也曾在京师顺天书院作教职。康熙三十一年，又入湖口榷使幕中。后来，又到好友张霖在西安的署中逗留一年。

"京师，公卿贵人之所辐辏，草泽贤人奇士所托伏。"[62]要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生存，就不能不与名公巨卿打交道。王源早期依附徐元文、徐乾学兄弟，也曾经应文坛新贵王士禛之请为其《皇华纪闻》作序。康熙三十六年（1697），大学士王熙七十岁，王源又应众人之请作《怡园记》为其祝寿。[63]与名公巨卿的

交往，王源只是勉强应付，大多没有深入的交往，真正能够给王源内心带来欢乐的还是那些同病相怜的困顿士人。他们在一起不是纵论古今，就是酣酒燕市。如，李嶟瑞（字苍存）数次来京应试，皆落第，常年滞留京师。两人结识后成为挚友。王源喜饮酒，二人经常痛饮朝市，"纵谈今古"，"醉则笑骂近代诗人"以及那些当时被尊为"百世之师者"[64]。康熙三十三年（1694），王源在游历关中期间结识了张翚（字采舒）。此人原本也是一位意气风发、有志于经世致用的少年奇才，"以友难系狱"[65]，在关中遣戍的十多年里，已经完全消磨了原先的志气，不仅"言语温温"，无复往日的豪言壮语，而且行为也"不逾圣贤之矩"。王源不禁感慨："天下魁奇非常，杰士激烈，消磨于患难，穷饿老死者，何可胜数！采舒年未四十，其性情学术如此，是岂终其身困穷，一无所表见于当世者！"[66]这恐怕也是王源对自己命运的无奈慨叹。

经过十几年的游历，王源"自负经世奇志"的豪情日渐衰退。他在给梅庚的一封信中说："源自幼奉教先君子及业师梁鹪林先生，所从游，莫非耆旧深雄魁博之士，数十年来，销磨无一存。"[67]王源不仅自己敛声息气，而且还劝说"不肯下同流俗"的好友陈于王"益敛其才，不与时人竞，息交绝游，择人而后友"。[68]这种劝诫无疑是王源在京师十余年来游历公卿士大夫间的切身体会。

坎坷的游历生活让王源感觉到自己的一腔抱负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十余年间，与自己志趣相投的好友凋谢殆尽，政治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的局势已经基本稳定。清初人们追忆明朝灭亡，寄情一代兴亡的故国情怀，也随着遗民的故去似乎一去不复返。社会形势变化，人情风俗也会随之变化，所以王源感慨"京华之人情风气，每阅二三年一变，变即有古今之殊"。清统治者在学术上尊崇程朱理学，以科举笼络人才。同时，严厉镇压那些不满清政府统治的士人，制造了不少文字狱。在这种社会情形下，士子们埋头苦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考试，为自己乃至家族博取功名和荣华富贵。可以说，举目四海，"以安于世俗为得计者，往往而是"[69]。

此时疲惫的王源也不是没有"偕隐"的想法。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在给侨居淮安的阎若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丈夫既不能有为于天下，则当修身洁己著书立说，上为千百世功臣，下为千百世师表，但未有栖迟无所、衣食无资而能隐居以求其志者。弟之不幸，不过欲数椽容膝，百亩供餐，足以闭户而无求，便可成其稽诵著述之志，乃谋之三十余年，终如河清难矣，岂非命邪？"二十年前，刘献廷离开北京之际就曾约他"偕隐"金陵。此次相约虽然未能成行，但王源一直梦想在拥有"数椽容膝，百亩供餐"的生活条件后"便可成其稽诵著述之志"。然而，这对于既放弃科举仕途又不入流俗的王源来说，谈何容易！尽管如此，王源依然打算与好友洪璟"相期为偕隐之计"，而且非常向往与阎若璩"商证"学业。[70]王源已经感觉到著述立说才是自己的最后归宿。

三、康熙三十九年至康熙四十九年客死淮安

正当王源准备"偕隐"以"成其稽诵著述之志"的时候，王源结识了李塨，又经李塨介绍，拜颜元为师。据《李塨年谱》载，1700年李塨入京会试，"晤王源昆绳，论学甚契"，这是两人结识之始。不久，王源便向李塨表达了要师从颜元的决定。他说："吾自少闻道学言，不慊；乃学经济，无所用；学古文，自谓必传于世。近闻吾子言颜先生学，又知文词亦属枝叶，非所以安身立命也。吾受业习斋决矣。"[71]由于颜元、李塨的影响，王源放弃了"偕隐"江南的计划。而他作出这个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颜元、李塨的学术主张引起了自己的共鸣，使他感觉到自己真正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

在学术取向上，王源与颜李学术本来就很接近。王源年幼时从学于梁以樟，"以樟谈宋儒学"，当时年龄虽小，但"闻之不首肯"[72]。其后，更坚持主张"兵战"、"地理"为经世致用之学而鄙薄理学之空疏。康熙三十三年（1694），王源在反驳朱书斥责王阳明的信中说："孟子殁后千数百年，全体大用才堪王佐

之儒，惟诸葛忠武、王文成两人而已。”认为孟子之后才堪大用者只有两人：诸葛亮和王守仁。至于宋儒“见圣人之体而不能全其用”，根本不足以“戡天下大乱”[73]。

颜李学术更是以事功为首，以实学为倡。钟陵在《习斋言行录》中记颜元之言：“盖由汉、宋诸儒，误人于章句，复苦于帖括取士，而吾儒之道之业之术尽亡矣。若古之谋道者，则有礼、乐、射、御、书、数等业，可以了生。”[74]以兵学为例，两人一见面便有共同语言。颜元问王源：“假以乌合数千，使子治之，何法为先？”王源回答说：“莫先束伍。”颜元感叹地说：“子真其人矣！”[75]对于理学的派别之争，颜元既反对独尊程朱也反对独尊陆王。他在评论张烈《王学质疑》时说：“吾尝见宗王子者指朱子为门外汉，吾不与之深谈，其意中尊王而诋朱未必不如是也。噫！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理学不仅“杀人”，而且最终导致了“圣道之亡”。颜元说：“吾观《质疑》而知圣道之亡也，不亡于愚夫愚妇，不亡于豪杰善人，偏亡于注疏章句、立宗传讲学之儒生。”[76]李塨也认为“自朱门立道学名”，后世学者“但取注经讲性天者为道学，遂相率为迂腐无用之学矣”[77]。

王源和颜、李二人的态度一样，也是要超越理学。他在反驳朱书的信中说：“今天下之尊程朱，诋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伪者几人哉？……尊程朱即程朱之贼，尊陆王即陆王之贼，伪耳……今之诋姚江者，无损于姚江毛发，而程朱之见推，实程朱万世之大阨尔。”[78]所以，当王源与李塨初次见面，看到其所著《大学辨业》时，便称赞此书“不凿附程朱、陆王，直传孔孟”[79]。

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李塨的引介下，王源正式拜颜元为师。第二年，颜元去世。王源从学于颜元的时间很短，但颜元本人还是非常看重这个弟子的。在《率王源释奠孔子文》中，他说：“今大兴王源素亦失心苍赤，过听虚声，委贽从游。愿我夫子默相上帝，阴佑斯人，使其成德也，勃然其兴行也，赫然得效片绩于乾坤，斯民之幸也，亦斯道之幸也。”[80]李塨与王源的交往则有六七年之久，两人经常相互论学。据《李塨年谱》记载，1701年李塨“语昆绳以吾儒心性持敬之功”，王源则向李塨“学礼”[81]。王源晚年著《平书》，“一洗历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古”[82]，请李塨为其订正。受李塨《易注》的影响，王源在晚年又开始学《易》，并撰《读易通言》五卷，其宗旨也是要廓清程朱理学对《易》学的附会。

毫无疑问，王源晚年的性格和学术旨趣都受到了颜元、李塨的影响。他的性格变了，收敛了原先豪迈不羁的狂放性格，变得“终日整衣冠，对仆隶必肃恭”；其学术旨趣依然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甚至“自负经世之略益坚”[83]，但同时在研究对象上不再局限于以往的兵战、地理学，而开始涉足“经义”，不再“仅以经济文章自见”[84]，而是“以明行圣道为任”[85]。

对于王源的这一转变，李塨曾经多次提及。据《李塨年谱》记述，在李塨印象中王源本来是个“自命英雄，夜定必置酒痛饮，面昂身挺，目电须戟，议论磅礴古今，醉则历骂贵显时流，杂以谐谑”的狂士，但经过他的一番开导后，王源有了很大变化。他曾向王源说：“王子误矣，吾人当与尧、舜、周、孔衡长短，乃毕之校论时辈耶？”听了李塨的话后，王源“大悔”，而且“立《省身录》，效习斋《日记》以考纠身心得失，晚年学益进”[86]。确如李塨所言，王源在1700年以后就经常写日记，“时刻自检”[87]。1703年，李塨看到王源的《省身录》，感慨地说：“王子昆绳，夙以天地民物为己任，久矣，今读其《省身录》，皭皭然返己内检，一无雄侈之意，何其谨也！试念王子平昔，翕张群汇，陵轹六合，是何气象哉，而一变至此！”[88]

王源本人也不否认李塨对自己的影响。1703年，王源离京西行，在赠别李塨的律诗中有“自与李子交，炳然见周行”和“于今得李子，枯藤依长松”[89]的句子。在给友人的信中，王源将李塨与早已去世的刘献廷相提并论：“源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刘继庄，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实抱天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90]可以说，王源已经将自己视为颜李学术的传人。

不仅如此，王源甚至还力劝方苞放弃程朱理学，希望他成为颜李学术的传人。

王源在劝说方苞的信中说："源故心悦而诚服焉……此颜先生所以不可不归，而刚主之书，不可不虚心读之，专力求之，反复观之，精详体之，而不得以世儒之成说自画，俗人之门户相持也。吾兄得无意乎？兄之天资，高明浑厚坚强，今人罕见其匹，要亦患学之不得其门，恐信道不笃，见纷华而悦耳。若果有泥途轩冕之心，毅然矢志于绝学，则源愿与同心合力，真参实究，由共学而适道、而立、而权，不难尔。"[91]方苞没有接受王源的劝说，自然也没有成为颜李一派的学人。反过来，在王源死后，方苞则公开批驳颜李学术，甚至宣称：经过他的一番劝说，王源幡然悔改。方苞曾这样说："吾友王源昆绳，恢奇人也，所慕惟汉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为迂阔……余作而言曰：'……子毋视程、朱为气息奄奄人！……'昆绳自是终其身，口未尝非程、朱。"[92]对于方苞这种说法，李塨的门人刘用可进行了反驳，认为这是"纯构虚辞，诬及死友"[93]。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刘师培等人也认为这是方苞的诬陷。王源劝说方苞的失败，直接造成了颜李学术后继无人而且遭人冷落，这也预示了清初经世致用学风在康熙朝以后日趋消歇的命运。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对待理学派别的态度上有所不同，另一个重要原因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有关。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绝大多数士子都对那些脱离举业功名而单纯倡导经世致用的做法失去了兴趣。出于科举仕途的需要，再加上清朝统治者的钳制政策，士人很难在追求利禄的同时公然反对程朱理学。这恐怕也是方苞在经历了戴名世《南山集》案后"诬及死友"的根本原因。

康熙四十九年（1710）王源客死淮安。所著诗文，生前没有刊刻，多藏于姻亲管世铭家，道光十一年（1831）其孙管绳莱将所藏王源文稿结集刊刻于金陵，是为《居业堂文集》二十卷。至于《平书》、《兵法要略》、《读易通言》、《舆图指掌》等著述皆散逸不存。

纵观王源一生，他作为一个遗民子弟，虽未能亲眼目睹明朝灭亡，但受父亲以及师友的影响，怀恋明朝的遗民意识以及家族流亡之根自幼便烙在了头脑中，并形成豪迈放达、崇尚气节的性格以及"喜任侠、言兵"的学术兴趣。然而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步稳定，在社会现实面前，其一腔情绪只能形诸文字。或表彰明末节烈、忠孝，或记述隐逸、处士；或参与胜国修史，总结明亡教训；或游历山川，寄情山水。晚年的王源历经人生周折，浑身锐气消磨殆尽，盛气委顿，最后客死异乡。对于一位充满经世抱负的遗民子弟而言，这种结局虽然充满悲情，但却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归宿。正如管绳莱所言："源以世家子弟，国变家毁，苍凉郁勃之气，无所发泄，一寓之于文。今其文具在，多纪明人逸事，发扬蹈厉，往复不穷，当时号为古文家者，未足与比也。然非遭时之艰，困心衡虑，乌能成其所至若此哉？晚而归宗于理学，夫亦盛气既平，知非悔过之所为与，后世读其文者，可以窥其志矣。"[96]

---

①㉑㉜㉞管绳莱撰《王昆绳家传》，见（清）王源《居业堂文集》卷首，《丛书集成新编》第7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②㉛㊳㊵㊶冯辰、刘调赞《李塨年谱》卷三，中华书局1988年。

③《居业堂文集》卷八《与毛河右先生书》。

④⑰《居业堂文集》卷七《与李中孚先生书》。

⑤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二《习斋学案》，台湾，《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

⑥《居业堂文集》卷十四《蒋度臣诗序》。

⑦⑨《居业堂文集》卷十八《先府君行实》。

⑧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王中斋先生八旬寿序》，《丛书集成续编》第15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

⑩《居业堂文集》卷十六《送廷尉常公归里序》。

⑪《居业堂文集》卷十八《梁鷦林先生墓表》。

⑫《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北省稿序》。

⑬《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刘雨峰诗集序》。

⑭《居业堂文集》卷五《秦舍人传》。

⑮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八《信芳斋文叙》，中华书局2003年。

⑯《居业堂文集》卷十三《梁质人文集序》。

⑱《居业堂文集》卷十三《洪去芜文集序》。

⑲《居业堂文集》卷六《与黄自先书》。
⑳《居业堂文集》卷十三《洪去芜文集序》。
㉒《居业堂文集》卷十二《兵法要略序》。
㉓《居业堂文集》卷六《复陆紫宸书》。
㉔《居业堂文集》卷十二《舆图指掌序》。
㉕㉗《居业堂文集》卷六《与王吏部书》。
㉖《舆图指掌》，跋，清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㉘《居业堂文集》卷十五《送胡心仲归南昌序》。
㉙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王中斋先生八旬寿序》曰："盖王氏世官锦衣，先生当烈皇帝朝，仕为指挥佥事，日直禁庐，凡天子兴居食息及仗下谟谟陈奏，靡不目睹而亲闻。尝慨野史氏失真，多诋诬烈皇帝盛德，为著《崇祯遗录》一篇。"
㉚李塨《恕谷后集》卷六《王子传》，四存学会1925年。
㉛《居业堂文集》卷十五《岁试录序》。
㉝杨无咎《万季野先生墓志铭》，见万斯同《石园文集》卷首，四明丛书本。
㉟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常熟陈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83年。
㊱祝渊《月隐先生遗集》卷四《临难归属》，丛书集成续编，第18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
㊲关于遗民不"世袭"的问题，可参见赵园著《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第七章"时间中的遗民现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㊳㊷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五《与王昆绳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㊴杨宾《晞发堂诗集》，转引自（法）戴廷杰《戴名世年谱》卷十一，第828页，中华书局2004年。
㊵㊽《居业堂文集》卷十六《送臧侍御序》。
㊶㊼《清儒学案小传》卷二《习斋学案》。
㊷《清史列传》卷六十六《儒林传上一》，中华书局1987年。
㊸《居业堂文集》卷六《复蔡静子书》。
㊹《居业堂文集》卷十六《送廷尉常公归里序》。
㊺《居业堂文集》卷十六《送孔东塘户部归石门山序》。
㊻《居业堂文集》卷十八《刘处士墓表》。
㊼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一八，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㊾《居业堂文集》卷十六《送王大宗伯致仕南归序》。
㊿53 59戴名世《戴名世集》卷五《送刘继庄还洞庭序》，中华书局1986年。
51刘坊《万季野先生行状》，《石园文集》前附。
52黄宗羲《南雷诗历》卷四《送万季野北上》，上海扫叶山房本1919年。
54《方苞集》卷十六《祭王昆绳文》。
55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王中斋先生八旬寿序》。
56费锡璜《掣鲸堂诗选》卷六《梅花堂雪中梅花·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7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
58《居业堂文集》卷十四《朱字绿诗序》。
60《居业堂文集》卷七《与戴田有书》。
61《居业堂文集》卷十三《颖上风物纪序》。
62《魏叔子文集·外篇》卷十《送歙县鲍生北游叙》。
63《居业堂文集》卷十九《怡园记》。
64《居业堂文集》卷十四《李苍存诗集序》。
65《居业堂文集》卷十六《黄复庵隐君六十序》。
66《居业堂文集》卷十四《张采舒诗序》。
67《居业堂文集》卷六《与梅耦长书》。
68《居业堂文集》卷十四《陈健夫诗序》。
69《居业堂文集》卷十四《京华集序》。
70《居业堂文集》卷七《与阎百诗书》。
73 78《居业堂文集》卷七《与朱字绿书》。
74钟陵《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学问第二十》，丛书集成新编，第23册。
75李塨、王源《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丛书集成三编，第85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
76颜元《习斋记余》卷六《阅张氏 < 王学质疑 > 评》，丛书集成新编，第76册。
77戴望《颜氏学记》卷六《上颜先生书》，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
79《居业堂文集》卷十三《大学辨业序》。
80《习斋记余》卷七《率王源释奠孔子文》。
82《居业堂文集》卷十二《平书序》。
83《方苞集》卷七《四君子传》。
84 91《居业堂文集》卷八《与方灵皋书》。
85《居业堂文集》卷八《与婿梁仙来书》。
86《恕谷后集》卷六《王子传》。
87《居业堂文集》卷八《与婿梁仙来书》。
90《居业堂文集》卷八《复姚梅友书》。
91《居业堂文集》卷八《与方灵皋书》。
92《方苞集》卷十《李刚主墓志铭》。
93《李塨年谱》卷五。